

的。他以命门概括脾胃，在阐发内伤病机上，尤其突出命门无形之火的作用。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，至此又为之一大变革。

据黄宗羲《张景岳传》说：“赵养葵名献可，宁波人，与介宾同时，未尝相见，而议论往往相合。”特别在命门这个问题上如出一辙，但景岳认为单以无形之火论命门又有未尽。他把各有专司的五脏六腑相互协调的关系，统一于兼具水火功用之命门。命门内寓真水真火，五脏之阴精，非此不能滋。五脏之阳气，非此不能发。阴虚阳虚皆为真阴之病。同时指出真阴与元阳是互为其根，认为阴不能没有阳“阴以阳为主，无气不能生形”；阳也不能没有阴“阳以阴为根，无形不能载气。”他在《真阴论》中，举真阴之象、真阴之脏、真阴之用、真阴之病、真阴之治以悉其义。“阴为精，阴成形”。精藏于内而肉形于外，此外在之形肉，即内在之真阴之象；又说五脏六腑之精，统归于肾，肾的藏精之所，叫做命门。精藏于此，是谓阴中之水，气化于此，是为阴中之火。命门内藏真阴，是兼具水火之脏；命门之火谓之元气，命门之水，谓之元精，命门之水火互济为十二脏之化源。此为真阴之用；如若命门之水亏，则水亏其源，阴虚之证迭出。命门之火衰，则火衰其本，阳虚之证迭出。无水无火皆在命门，一切阴虚阳虚之病。统属真阴之病；至于真阴之治，凡阴虚阳虚诸病证，当求之于兼具水火之命门，舍此非其治。由于他对真阴如此之重视，因而在遣方用药上，也处处维护真阴，对六味八味之应用指出：“真阴既虚，则不宜再泄，二方俱用茯苓、泽泻、渗利太过……未免减去补力，而奏功为难矣。”故自制左归饮以壮命门之真水，左归丸以培补肾之元阴。总之，他不论在肾命水火问题的阐发上抑或在温补命门的遣方用药上，张景岳不愧为独具匠心之巨匠。

至此以脾胃、肾命水火为中心探讨脏腑虚损病机之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，已臻形成。它以完整的、独特的一套理、法、方、药，自成一个学术思想体系，是祖国医学流派中颇有影响的一派。它经受数百年医疗实践之检验，具有极大的临床使用价值。

### 结 语

以张元素脏腑辨证为中心，李杲宗脾胃为本，景岳、献可以肾命水火立论，各自从不同的角度，

来探讨脏腑的虚损病机，是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。但脾胃与肾命关系至为密切，一为先天元精、元阳之发端，阴阳水火升降之枢纽；一为后天气血化生之来源，清浊升降之枢纽。只有生生化化，升降有常，脏腑才能互为其用。只有以先后天并论、脾胃肾并重，视病之先后、辨证之标本，或重于脾或重于肾或脾肾兼顾，这才是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之真谛。

## 试论刘禹锡 在我国医学上 的贡献

河南中医学院 申志钧  
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 蓝醒生

对于刘禹锡，从唐书本传至今，人们只是说他是唐代中叶的大诗人，著名的文学家、政治家及唯物主义思想家。既使有关中医书籍，如现行高等中医院校的《医古文》教材等，在刘氏《鉴药》一文说明中，也只是加上“他还通晓医药学，曾著《传信方》，现有辑佚本”这么一句。甚至连冯汉鏞氏的《传信方集释》（1958）一书序文里，先是说：“不过宋祁和辛文房叙述刘禹锡的事迹时，只偏重于他的官职与文学成就。事实上，刘氏不仅在文学方面有高深的造诣，同样地，他在医学上也有深入的钻研”，但同时又说：“所可惜的是他仅仅给家中的一些亲属治病，而没有把医术用来济世活人”。因而也没有把刘禹锡称为医学家。其实，刘禹锡在我国医学史上一位卓有贡献的，对后世颇有影响的，名副其实的医学家。

刘禹锡（772—842），字梦得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童年时因体弱多病，受尽巫婆“针烙灌饵”，使他“哑然啼号”的摆布；少年时每当看到同龄伙伴，个个“武健可爱”，总是为自己的瘦弱多病而羞愧。这时他便立志学医。

刘氏先向一位号称“富于述”的祖传医生借书攻读，先后读完《小品方》、《本草》、《雷公药对》及《素问》等书，打下了坚实的医药学基础。以后就进一步学习切脉诊病，等到他的医学专著《传信方》问世时，他已经是一位习医近三十年的老医生了。其临证疗效是“疾辄良已”，说明刘氏的医术是相当高明的。

不错，刘氏曾说过“其术足以自卫”，“或行乎门内”，“家之婴儿未尝诣医门求治者”的话，但是，却不能作为刘氏“没有把医术用来济世活人”的证据。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《传信方》的记述就可明白。如在“治眼风泪生翳赤眦方”的记述中，有“万万不失，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”的话；在“治蛇咬蝎螫方”中，有“此极神验，得力者数十人”，并且还有“两僧流向南，到邓州，俱为蛇啮，令用此法救之，傅药了便发，更无他苦”的具体记述。由此可见，刘氏的方剂能治愈几十人，就决不会只是用来“自卫”和“行乎门内”了。这些还只是《传信方》问世这一年之前的记述。刘氏一生行医五十年，“济世活人”，决不在少数。因此，他对解除当时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所做出的贡献，是不能抹灭的。只不过他是一位兼职医生，其行医范围不如专职医生那样广罢了。

作为医学家的刘禹锡，其主要贡献还是他的医学专著《传信方》。此书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(818)，刘氏在连州(今广东连县)任刺史汇编的一部方药书。这一年，他在医药研究方面的志同道合者薛景晦，从道州(今湖南道县)刺史任上给他寄来自己汇编的《古今集验方》。刘氏在复信中对《古今集验方》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，说它有以单方治病的占多数，药物便可寻找，价格低廉，经过临证反复实践，确有疗效，并且还有以防病为主等特点。这也正反映了刘氏自己的医学观点。随后又谈了一些用药和炮制药物的具体做法，充分反映了他“于药石不为惜”的话。这以后薛景晦又写信请刘禹锡把自己收集的医方也拿出来。刘氏听从了朋友的建议，于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完成了汇编方书工作，并写《传信方述》为序。在短短序文中，刘氏极力推崇“一物足以病者”的民间单方和“取诸屑近”的验方，并注重实际效果。《传信方》就是将“篋

中得已试者五十余方”汇编而成，皆有所自，并以传信为目。就是说，都是在临证实践中试用有效的，故名《传信方》。

《传信方》虽然只收了五十余方，但它所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，有内、外、妇、儿、眼、口腔、皮肤等科方药。所治的疾病，如霍乱、痢疾、咳嗽、脚气、眼病、疔疮、湿癣、妇女月经、打扑损伤、蛇咬蝎螫等，都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。有些方药还具有其它方药书所没有的独创性，如用羊肝和黄连制成的羊肝丸治白内障，不用传统的针拨方法，服药后能使内障消失，这的确是中外眼科史上的一个创举；再如用呵梨勒入白蜜治眼睛风赤涩痛，是任何其他中医方书中均无记载的。这说明《传信方》的医学价值是相当高的。

《传信方》中所用药物，也大多是山前幕后很容易采到的中草药，如大豆生姜治腹中痞痛、牛蒡根汁治热厥、山李子和野蔷薇根治口疮、皂荚矾加醋治喉痹等，都具有简、便、验、廉的特点，因而受到群众欢迎。正如《传信方集释》作者所说，它的价值“实不亚于赵学敏的《串雅》”。刘禹锡主张“医极道贵广”，因而《传信方》的方剂来源也是相当广泛的。如用干姜、皂荚、桂心三味炮制为丸，治疗一切嗽得上气者，是年青的刘禹锡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经掌书记时，同僚李亚传给；又如治干霍乱盐汤方、杉木治脚气方、蛻螂心拔疗毒方等，都是其挚友柳宗元传给，刘氏称之为“柳州救死三方”。但是，多数方剂是刘氏从民间收集的。如用芦荟炙甘草治湿癣方，是他少年时患癣，在楚州(今江苏淮安)偶然遇到一位卖药的摊上学到的；再如用葱涕治打扑损伤方，是从一位不知名的普通“军吏”那里传来的，又如治小儿热疮的乱发鸡子膏，是他根据“俗中祖母为小儿作鸡子膏”的方法创制的。

正因为《传信方》未自人民群众，又有很高的疗效，所以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唐以后的许多方书，如苏颂的《图经本草》、沈括的《良方》、唐慎微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、许叔微的《本事方》、洪遵的《集验方》、陈师文等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、杨用道的《广肘后方》以及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等，都引用了《传信方》的方剂。《传信方》还传到国外，为中外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。

### 三

早在刘禹锡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篇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文章《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地方状》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唐德宗颁行了一部方药书《广利方》（又名《贞元广利方》）。该书收方586个，刘禹锡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说它是：“搜方技的秘要，拯生灵之夭瘵，坐比华胥，咸跻仁寿”。因而也受到了国际友人的重视。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唐朝友邻新罗国（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）的使者朴如言，向淮南节度使杜佑提出，希望把这部书带回国。因此事涉及两国文化交流，杜佑不敢自专，就让掌书记刘禹锡向德宗请示，刘氏就写了此“状”文。

刘禹锡在这篇文章中说：“臣以其久称藩附，素混车书。航海献琛，既已通于华礼；释荷蠲疠，岂独隔了外区？正当四海为家，冀睹十全之效”。在这里，刘氏把医学看成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，这种消除疾病，解除人民疾苦的事业，是不能“隔于外区”的。应当让医学“四海为家”，让医学成就成为全人类的财富，希望在全世界都能看到它的“十全之效”，更不消说是有着悠久友好关系的“素混车书”邻邦了。由此可见，刘氏对中外医药交流，抱着多么积极热情的态度。早在一千二百年前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医生，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

刘氏这一进步思想和主张，是终生坚持和奉行

（上接第54页）在讲医古文时，一定要做到医理文理两不悖，否则，就难免产生误解，或其中必有一误。

〔白术〕主风寒湿痹，死肌、痉、疸……。

《神农本草经读》

“风寒湿痹”，若单纯以文分析，就很可能认为“风、寒、湿、痹”是并列词组当谓语“主”（名词活用为动词）的宾语，或偏正词组“风寒湿的痹”，等等；若结合医理，则顿觉大谬不然。陈修园注：“其曰风寒湿痹者，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也。三气杂至以湿为主。”依此，“风寒湿”是名词（寒，寒邪，湿，湿邪）活用为动词作“痹”的定语。“三气杂至以湿为主”，只能从医理去体会了。

损有余，益不足，反者益其。

《灵枢·寒热病》

的。他在《传信方述》中说，他正是从“医拯道贵广”这一主张出发，才让自己的《传信方》问世。在《传信方》中，有两个眼科方剂（用黄连、蕤仁、干枣治眼风泪痒生翳赤眦方和用呵梨勒入白蜜治目赤痛方），据考证是给刘禹锡治过眼病的婆罗门（印度）僧人传给他的，而“呵梨勒”这个药名本身，就是梵语的译音。至于《传信方》中的“牛乳煎菘菔治虚冷久痢方”，则是广泛流行于波斯（今伊朗）和大秦（今土耳其一带）的一个补虚弱的方子，并“累试于虚冷者必效”。

交流是互相的，《传信方》中的一些方剂，如治干霍乱盐汤方、麦饭石治痈疽方、杉木治脚气方等。被日本人丹波康赖于永观二年（宋雍熙元年，984年）编的《医心方》所引用，尤其是《传信方》散佚后，有的方剂，如用黄芩、黄连治赤白痢、鹅鸭肝方等，只有《医心方》中还有记载，成为中日两国医学交流的一个见证。另在《传信方集释》中所辑出的四十五个方剂中，有九个曾被朝鲜许浚编的《东医宝鉴》所引用。由此看来，刘禹锡生前身后，都为中外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。

综合上述，象刘禹锡这样一位医术造诣颇深，临证经验丰富，又有医学专著，并对医学史的研究和中外医学交流作出过贡献，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医学家，应该载入中国医学史册，并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#### 主要参考文献：

1. 《刘宾客集》中“述病”、“论方书”等；
2. 冯汉编：《传信方集释》。

“益其”的“益”是动词？是形容词？还是副词？有无活用？若仅以文言，“益”似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，因它后边有代词宾语；但一结合医理，就贻笑大方了，绝对此理。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》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，把句号标在“益”字后，把“其”当为下句的开头，但仍令人费解。校读《甲乙经》“其”为“甚”。“益甚”，就是加重病情的意思。如此医文两通。“益”就是表程度的副词明矣；它与“益不足”的“益”截然不同。

以上仅就学习古医籍中词类活用的方法谈了个人几点粗浅看法，而其基础是首先要学好词类、句子成分、古汉语知识和中医药学的常识；否则，就失去了理论指导和说理工具，也就无可言状了。